

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 界定标准及测度研究

——基于生活质量法

□孔涛 □吴琼 □陈少波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我国收入分配政策执行的重要目标。实现我国中等收入群体为主、“橄榄型”的社会结构不仅是单维的收入增长问题,也涉及中等收入群体生活水平的提升与生活质量的改善。本研究在对已有中等收入群体界定标准及测度相关文献综合归纳的基础上,以生活质量法对中等收入群体进行界定与测算,并使用接受者操作特性曲线对比生活质量法与收入标准法,分析各自特点及具体适用场景,并讨论本研究的政策意涵。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2—2018年的数据分析表明,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和比例近年来逐步上升,2018年已有31.0%的家庭、约3.6亿人达到中等生活质量水平。

关键词:中等收入群体;测度标准;生活质量;共同富裕

中图分类号:F1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23)06—0054—12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长期保持着高速发展的态势。2021年我国人均GDP达到80976元,按年平均汇率折算为12551美元^[1]。然而,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居民收入不均等的状况也逐渐凸显。2008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达到最高点0.491,此后波动下降,2020年为0.468^[2]。总体而言,过去十年中,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的程度有小幅改善,收入不平等加剧的势头得到缓解,但其总体水平仍在高位徘徊。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提高人民收入水平的同时优化收入分配、改善人民生活是关乎共同富裕,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重要问题。

中等收入群体占比,即中等收入群体占全部人口规模的比重,是收入分配格局合理与否的重要标志。逐渐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不断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推进我国居民的收入逐渐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分配结构,可有效缩小贫富差距,促进收入分配公平,增强社会和谐稳定及国家长治久安。同时,由于中等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较高,扩大其比重可进一步增加居民的消费和投资需求,促进经济增长模式转换与高质量发展。正因为如此,党中央的一系列重要文件着重阐明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指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是转方式、调结构的必然要求^[3]。2020年,“持续提高低收入

基金项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就业收入分配和消费司研究课题“提高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调查与对策研究”“中等收入群体细分重点群体跟踪调查研究”

作者简介:孔涛,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副研究员;吴琼,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副研究员;陈少波(通讯作者),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更加积极有为地促进共同富裕”被列入“十四五”规划^[4]。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一文中强调“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思路^[5]。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完善分配制度的重要表现^[6]。

在政策实践层面,有效制定和执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相关政策必须建立在准确和透彻掌握中等收入群体现状的基础上,而准确地识别和全面了解这一群体的前提是对其中科学地界定。此前已有对中等收入群体的测度多以收入标准为主,对该群体所对应的生活品质较少全面体现,使得“中等收入群体”作为一个政策概念与其所服务的“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等具有丰富意涵的政策目标的联系有待加强。一些收入标准尽管其背后蕴含了生活质量的理念,但公开学术资料中尚未有明确可用于具体测算的指标体系;另有学者提出过生活质量指标,但也仅限于分标准测算,而非以生活质量作为系统识别中等收入群体的口径。在这方面,本文的主要贡献是在完善已有测度标准的基础上:(1)提供一套以生活质量法系统界定中等收入群体的具体标准,(2)利用公开微观数据库进行完整测算并展示该标准的可行性,(3)基于ROC分析将生活质量法的测度结果与已有主流标准进行对比和评析。

本文后续部分的内容如下:第一节为文献综述,聚焦对中等收入群体的概念和定义、界定标准与方法、所使用数据的对比与评价;第二节介绍基于生活质量法构建的界定中等收入群体的具体标准,特别阐明其中所选取的每个指标的理论依据,并展示具体测算结果;第三节将生活质量标准与主流收入标准进行对比,评价各自的特点及适用场景,明确本文所提出的界定方法对现有文献的附加价值;第四节简要总结并讨论本研究的政策意涵。

一、文献回顾

(一)中等收入群体概念与定义

中等收入群体是我国特有的概念,近似于欧美国家的中产阶级(middle class)概念,但并不像中产阶级一样考虑职业、身份认同、价值观等社会学特征,而是更加侧重经济维度的解释。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首次提出“中等收入者”的概念,研究初期学者们多倾向于通过收入水平衡量中等收入群体^[7-8]。但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学者们在收入标准之外,开始考虑中等收入群体应具有较高的生活质量^[9-12]。

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政府对人民生活水平与质量更加重视。政策制定者一般认为中等收入群体是指一定时期内收入保持在中等且相对稳定、具有中等生活质量的群体^[13-15]。2019年1月,时任国家统计局局长的宁吉喆在2018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记者会上表示中等收入群体家庭应具有购车、购房、闲暇旅游的能力,也体现了对生活质量的重视^[16]。2021年7月,“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断扩大、结构持续优化、生活品质不断提升”写入《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2021—2025年)》中^[17]。综上所述,已有相关研究与讨论已经形成的基本共识是中等收入群体可直观理解为收入中等的人群,且其应具有一定的生活标准。然而,无论官方或学界,各方提到的“中等收入群体”虽然名称相同,但在概念认识上有所差别,其关键在于如何构建合理的(收入或多维)指标体系,以体现中等收入群体应有的生活标准。

(二)中等收入群体测度标准与方法

现有文献中测度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与方法较多,这里归纳为以下几大类:一是定性标准,社会学者对中等收入群体的研究较早,张翼^[18]以阶级概念做划分,将拥有一定资产并雇用7人以下的业主或自雇者视为老中产阶级,将无资产、受雇于国家机构、企业等的非体力劳动者视为新中产阶级;李强^[19]则将白领阶层视为中等收入群体;李春玲^[20-21]将定性标准与定量标准相结合测度中等收入群体,如职

业+收入+消费+主观认同感、职业+收入+教育,其中职业、主观认同感、教育均是定性测度标准。二是定量标准,包括绝对标准与相对标准,主要可分为收入、消费、财富三类标准。

首先是收入标准,尽管学者们在中等收入群体的概念认识上已兼顾到生活质量,但可能多出于数据可获得性和指标应用便利性的考虑,以收入为单一维度的测度标准仍然最为广泛。收入标准分为绝对收入标准和相对收入标准,绝对收入标准是以收入的绝对数值区间测度中等收入群体,具体收入指标可使用家庭年收入^{[16][22]}、人均可支配收入^[23-26]、人日均收入^[27]等。其中,作为权威官方口径且应用最为广泛的是国家统计局的家庭年收入10万元—50万元(2018年)的标准^[16]。

对比而言,相对收入标准是基于某个相对的收入区间测度中等收入群体。比如,Foster & Wolfson^[28]、龙莹^[29]以分别以收入中位数的75%—125%、75%—150%、50%—150%进行测算;杨修娜等^[30]、阮敬等^[31]使用了收入中位数的67%—200%;吴鹏、常远^[32]则选取收入中位数的75%—125%;李培林、张翼^[33]则把城市户籍人口的平均收入线以上到平均收入线的2.5倍的人群定义为“中等收入层”。此外,也有学者以居民收入的某个固定的分布区间的相对标准来衡量“中等”。比如,托马斯·皮凯蒂^{[34][254]}将收入十等分组中的第6—9组视为中产阶级;李培林、朱迪^[10]将收入25%—95%分位点的人群视为中等收入群体。此类标准可观测中等收入上下限的变化,但对占比变化的测度有时受限。

量化标准的第二种是消费标准,既可使用人均日消费支出这样的绝对的消费规模指标来确认^[35-36],也可使用恩格尔系数^[37]、文化娱乐及服务支出占比^[13]、家庭耐用消费品拥有情况指数^[20]等消费结构指标。

第三种量化标准所关注的是财富水平,要求学者所使用的数据中具备较全面的财富数据,也因此较为受限。少量研究如甘犁^[38]和Credit Suisse^{[39][21]}均使用个人净财富的绝对规模测度中等收入群体。

对于中等收入群体的生活质量,尽管已有的研究提出了一些具有参考价值的指向性变量,但较少有学者在具体测度时系统考虑生活质量。比如,李培林、张翼^[37]认为中间阶层的恩格尔系数应处于50%—59%,狄煌^[40]则认为中等收入群体的恩格尔系数应在25%以下,两者差异较大;李春玲^[20]通过设定家庭耐用消费品拥有情况指数,将6分以上视为中等收入家庭;苏海南^[41]认为中等收入群体人均住房面积应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且拥有一定数量的金融资产。较为权威的讨论是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和社会发展研究所课题组^[13]首次系统提出了以生活质量法测度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即(1)恩格尔系数应在35%以下;(2)人均居住面积应达到30平方米以上;(3)人均蛋白质日摄入量应达到85克以上;(4)文化娱乐及服务支出比重应在40%以上。但该课题组仅提出标准,或许由于数据的局限并未进行相应地测算。从具体测度标准的角度,李强、赵罗英^[42]认为中等生活水平指标应涵盖收入、财产、消费、生活方式、主观生活态度这五个指标,并分别进行了测算。可以看出,生活质量的测度标准比较多样,收入、消费、财产、饮食、住房、娱乐等均可反映一定的生活质量,因此在测度时应注重其多维性与综合性。

(三)中等收入群体测度所使用的数据

实际研究中,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准确测度需要借助高质量的微观数据库。比如,李强、徐玲^[11]同时使用了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和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阮敬等^[31]也使用了CFPS数据;杨修娜等^[30]、李实^[43]使用了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甘犁^[38]使用了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李培林、朱迪^[10]、张翼^[18]、李春玲^[27]、李培林、张翼^[33]使用了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数据;龙莹^[29]、吴鹏和常远^[32]使用了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

以上所涉及到的多个微观数据库各具特点。比较而言,CFPS的优势在于其可追踪性,数据维度比较丰富,目前发布数据覆盖年份为2010年、2012年、2014年、2016年、2018年、2020年(部分公布),疫情之前历次全国调查跨轮追踪率均超过80%。CHIP则为专门追踪中国收入分配的动态情况的调查,其中

所含收入数据较为详实。CSS的特点则在其对社会阶层地位流动、社会保障、价值观等社会学特征的关注上,社会学研究者较多使用。此外,CHFS的侧重点在于家庭经济金融情况,CGSS侧重于调查社会变迁的趋势,CHNS则主要用于调查中国人口健康及营养状况。事实上,中等收入群体的测度方法与微观数据库的选取有较大相关性,不同数据库的侧重点有所差异,而所基于的数据库必须能够支撑测度方法的要求。

二、生活质量法测度方法及结果

(一)数据选取

中等收入群体的研究对象为家庭或个人,其识别需要单个家庭或个人的收入、消费及财产多维信息,而宏观或加总数据明显无法满足这一要求。同时,准确测度中等收入群体作为重要的基础研究,其最终目的还是为制定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相关政策提供科学依据。因此,研究中经常涉及的因果分析需要连续追踪的数据。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是一项全国性、大规模、多学科的社会跟踪调查项目,旨在通过跟踪收集个体、家庭、社区三个层次的数据,反映中国社会、经济、人口、教育和健康的变迁,并为学术研究和公共政策分析提供数据基础。CFPS 重点关注中国居民的经济与非经济福利,以及包括经济活动、教育成果、家庭关系与家庭动态、人口迁移、健康等在内的诸多研究主题。2010年,CFPS基线调查在全国展开,样本覆盖25个省、市、自治区,161个区县的644个村居,共计成功访问14960户家庭的42590个成人和儿童。综合判断,CFPS家庭经济库可以较好满足本研究在测度中等收入群体时对于生活质量法所需的数据丰富度要求,同时兼具支撑后续研究的追踪性。本文使用CFPS2012年、2014年、2016年、2018年数据进行测算^①。

(二)测度方法:生活质量法

“生活质量”强调生活水平对人的生存与社会发展的意义,并借此对传统经济学仅以收入水平等客观要素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程度和国民生活水平指标的做法形成重要补充^[44]。本研究在测度方法上的核心思路为:基于CFPS家庭经济库,通过多项中等收入群体的生活质量标准确定满足条件的家庭,在剔除同样满足中等生活质量的高收入家庭之后,剩余即为中等收入群体。本研究选取的生活质量标准可概括为饮食、居住、出行、娱乐、保健(以下简称食、住、行、娱、健)五个维度,以反映较为丰富的生活质量内涵。其中,食、住不仅对任何家庭来说都是必要的生活需求,同时需要达到一定水准;而行、娱、健所体现的生活质量则与家庭经济状况有较大关系。基于上述考量,本研究将食、住设为中等收入群体必须达到的生活质量,行、娱、健三个方面的生活质量则至少需要满足一项。具体测度方法如下:

1. 恩格尔系数小于40%或人均食品支出超过均值

恩格尔系数是指一个家庭中食品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可反映家庭生活水平或质量。根据恩格尔定律,随着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总收入(或总支出)中用于购买食物的支出会下降。当平均食物消费水平足够高时,收入的增加便不再影响食品支出的变化。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划分标准,恩格尔系数40%—50%为小康水平,30%—40%为富裕水平。我国2021年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9.8%^[45],且大部分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已达到富裕水平。本研究选取恩格尔系数小于40%作为中等收入群体生活质量的一个标准,同时考虑到个别家庭的消费结构可能偏好于食品,尽管其恩格尔系数大于等于40%,但其较高的人均食品支出水平已体现中等生活质量,因此添加人均食品支出超过平均值的并集条件。如表1所示,2018年有61.9%的家庭恩格尔系数小于40%,有46.3%的家庭人均食品支出超过均值。2012—2018年,

^①由于难以细化识别旅游、保健、美容等支出,测度时未使用CFPS2010年数据。

满足本条件的家庭占比由74.7%增长至91.7%。

2. 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到30平方米

住房作为一种特殊商品,既满足人们居住的刚性需求,同时也是高增值的财产,人均住房面积体现了生活空间的舒适度。我国以实现全体人民住有所居为目标,目前已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住房保障体系。2019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到39.8平方米,农村则达到48.9平方米^[46]。通常而言,当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将保持基本稳定,居住水平改善由提高住房面积转为提升居住品质。但各界对于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到舒适的标准,并无统一认识。2004年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提出了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时应实现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35平方米、农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40平方米的目标^[47]。然而,2007年建设部科技司所颁布的《宜居城市科学评价标准》规定城市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不得低于26平方米^[48]。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13]则认为中等收入者的人均居住面积应达到30平方米以上。近年来,税收学者对房地产税免税面积的讨论也可提供一定参考。比如,《我国房地产税立法问题研究》课题组^[49]认为可考虑对城镇居民人均免税面积设为30平方米;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也在2017年、2019年问卷中假定房地产税免税面积为30平方米进行相关调查^[50]。实践中,上海试行的房产税人均免征面积为60平方米^[51]。综上,本研究将中等收入群体的人均住房面积设为达到30平方米。如表1所示,2012—2018年,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到30平方米的家庭占比由59.4%增长至64.3%。

3. 拥有汽车或人均交通支出超过均值

汽车是一个家庭的耐用消费品和动产,也可作为生产工具。汽车通过缩短通行时间满足了家庭在工作、学习、出游时的代步需求和小宗物资的运输需求,明显改善生活质量,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也满足了部分人以汽车代表财富和地位的心理需求。当然,相对于食品和住房,汽车持有的必要性较弱。但随着家庭经济水平的提高,我国私人汽车保有量不断提高,2021年私人汽车保有量达到26246万辆,私人轿车保有量达到15732万辆^[45]。同时,考虑到部分家庭因人口较少或缺乏驾驶技能等并无持有汽车的刚性需求,但其出行以打车为主,交通支出已超过平均水平,达到中等生活质量,因此加入人均交通支出超过均值的并集条件。如表1所示,2018年有40%的家庭拥有汽车,35.6%的家庭人均交通支出超过均值,52.4%的家庭满足本条件。2012—2018年,满足本条件的家庭占比由31.3%增长至52.4%。

4. 有文化娱乐或旅游支出

文化娱乐及旅游支出体现闲暇消费的能力。相较于食品、住房、交通支出,文化娱乐及旅游支出与收入水平变化的相关性更大,即弹性更高。此外,文化娱乐项目与偏好相关且异质性较大,文化娱乐的支出成本并不能完全反映生活质量的高低。比如,跳广场舞、参加社区合唱团等文化娱乐项目并不需要较高的成本,但如KTV唱歌、观看各类剧场表演等活动的成本则相对较高。旅游支出也类似,近郊旅游、跨省市县旅游、出国旅游的消费水平完全不相同,旅游支出的水平不可完全表征生活质量。基于此,本研究选择定性标准,将有文化娱乐或旅游支出认定为有文化娱乐旅游项目并达到中等生活质量。如表1所示,2012—2018年,有文化娱乐或旅游支出的家庭占比由27.2%增长至60.2%。

5. 保健美容支出占比超过平均占比或人均保健美容支出超过均值

统计上一般将健康支出中的医疗支出和保健支出合并为“医疗保健支出”,但实际上二者性质不同。医疗支出属于居民遭遇疾病时的被动消费,而保健支出(包括健康锻炼及购买保健器械、保健品等)则是居民提升内在健康程度、预防疾病的主动消费,更能体现生活质量。美容支出(包括购买美容化妆品、美容护理、按摩等)则是美化外在容貌和形象的主动支出,美容活动可通过改善外在形象提升自信心,改变生活态度,提升生活质量。同时,美容活动一般也具有保健功能,因此,本研究将保健与美容支出统一考虑,满足“保健美容支出占比超过平均占比”或“人均保健美容支出超过均值”即可视为达到中

等生活质量。如表1所示,2018年有30.8%的家庭保健美容支出占比超过平均占比,23.1%的家庭人均

表1 2012年、2018年满足中等生活质量条件的样本家庭占比(单位:%)

序号	标准	2012年			2018年		
1	恩格尔系数小于40%	43.4	74.7	39.5	61.9	91.7	48.5
	人均食品支出超过均值	40.8			46.3		
2	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到30平方米	59.4			64.3		
3	拥有汽车	15.1	31.3		40.0	52.4	
	人均交通支出超过均值	26.3			35.6		
4	有文化娱乐或旅游支出	27.2			60.2		
5	保健美容支出占比超过平均占比	8.3	18.3		30.8	35.7	
	人均保健美容支出超过均值	16.7			23.1		

保健美容支出超过均值。2012—2018年,满足本条件的家庭占比由18.3%增长至35.7%。

根据测算,2012—2018年满足中等收入的食、住条件的家庭占比由39.5%增长48.5%,且

满足行、娱、健条件的家庭占比增长更为明显。2018年35.2%的家庭在满足食、住条件基础上,行、娱、健三项至少满足一项,22.1%的家庭至少满足两项,9.8%的家庭可以满足全部的中等生活质量标准。鉴于不同家庭提升生活质量的方式并不趋同,过于严苛的限定条件不能准确、全面地测度中等收入群体。同时,考虑到通过较多的样本能够更准确地分析中等收入群体特征并进行相关研究,在本文后续分析中以在满足食、住条件基础上,行、娱、健三项至少满足一项作为中等收入群体的生活质量标准。

(三)测度结果

由于多数高收入群体也可达到本研究设定的中等生活质量标准,因此在具体测度中将达到中等生活质量且人均收入较高的家庭应被视为高收入群体^①。最终对中等收入群体测算结果如下:

如图1所示,2012—2018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家庭占比由17.4%上升到31%,平均每年提高2.3个百分点,人口数量由1.96亿人增长至3.58亿人,平均每年增长约2711万人。由于高收入群体占比较低,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主要源自低收入群体的向上流动。当使用国家统计局的三口之家收入10万元—50万元(即人均收入33333—166667元)测算时,2018年中等收入家庭占比为

29%,人口约为3.2亿人,与生活质量法测算结果比较接近,但低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4亿中等收入群体人口,其原因可能是CFPS对收入的统计口径相对狭窄,如CFPS中的财产性收入仅包括家庭通过投资、出租土地、房屋、生产资料等获得的收入,未将自有住房折算净租金纳入,或在微观数据调查中,住户普遍习惯于低报收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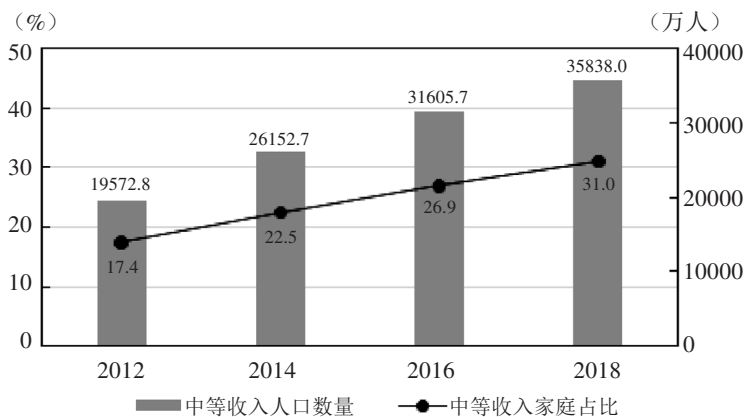


图1 2012—2018年基于生活质量法的中等收入群体变化情况

^①2019年1月,时任国家统计局局长的宁吉喆在2018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记者会上表示以典型的三口之家年收入在10万元—50万元计算,2017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梳理资料可发现,国家统计局的中等收入标准在2010年为家庭可支配收入8万元—40万元,2015年为9万元—45万元。基于此,在达到中等生活质量的基础上,本文测度将2018年三口之家年收入超过50万元视为高收入群体,2014年、2016年这一标准为超过45万元,2012年为超过40万元。

三、生活质量法与收入标准法的对比

收入与生活质量具有很强的相关性。收入作为生活质量的重要基础,可显著影响人们的可感生活质量^[52]。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增长与生活质量的改善基本同步进行,收入增长意味着生活保障能力的提升,进而引起消费结构由“满足生活必需”向“追求生活品质”的转变,生活质量随之改善。但现实生活中,二者之间又有细微差别,收入差距未必能真实反映生活水平间的差异,如一些大学生选择提前消费、超额消费,追求不符合实际收入状况的生活质量;在具有高昂房租和物价的一线城市,即便是月入过万的白领也可能面对超过1小时的通勤时间和人均仅10余平方米的居住面积,可见收入水平与生活质量也并不是完全对应,收入数据很多时候并不能真实反映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

尽管生活质量的改善与收入的增长都是同样重要的问题,但生活质量法与收入标准法的测度逻辑完全不同。收入标准法单以收入这一维度测度中等收入群体,测度直接、简便、适用性强,符合中等收入群体的基本定义。而生活质量法则需要可以反映生活质量的多维指标,更注重中等收入群体由收入增长引致的生活水平提升,测度相对复杂且间接,其标准的推广必须以高质量的微观数据作为支撑。生活质量法弥补了生活成本差异不能反映在中等收入群体测度中的缺陷,避免了因不同地区生活成本差异造成的结果异常。

此外,相比较收入,消费通常具有平滑性。根据弗里德曼在1956年提出的持久收入假说,家庭会通过在收入正常时期的储蓄来平滑在经济冲击时期的消费。现实中,不同家庭平滑消费的能力差异可能很大,城市家庭、无失业成员家庭基本可以平滑全部的消费^[53],但陈玉宇、行伟波^[54]研究则发现无论富有家庭还是贫困家庭在面临外生的收入冲击时都不能很好地平滑家庭消费。总体来看,基于消费平滑理论,生活质量法反映的食、住标准及在行、娱、健方面的主要以消费评价的生活习惯相对于收入的变化幅度应更低,因此使用生活质量法测度的中等收入群体也较为稳定,不会因收入的变化而在中等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之间频繁流动。相比而言,收入的波动则十分常见,尤其是对于中等收入下限边缘的人群,其收入状况受经济影响较为明显,经济繁荣时,其收入明显上升,经济衰退时,其可能面临收入下降甚至是失业的风险。

另外一个显著影响中等收入群体占比的因素是收入的上限和下限标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为了实现社会结构从“金字塔型”向“橄榄型”的转变,2012—2018年我国居民收入分布的“金字塔型”结构有所弱化,这意味着低收入群体的收窄和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但整个社会仍以低收入群体为主,中等收入群体占比相对较低。“金字塔型”的收入分布结构意味着使用收入标准测度中等收入群体时,中等收入下限附近存在大量潜在的中等收入群体。这些群体对收入下限非常敏感,下限越低,中等收入群体占比越高。同时,中等收入的上限水平也会影响中等收入群体占比,但我国现有高收入分布人群较少,对中等收入群体占比影响相对较小。

此外,从图2也可看出,具有中等生活质量的群体收入分布较为广泛,并非聚集在中等收入区间内。这说明中等收入与中等生活质量并非完全重合,一些收入较低的家庭仍然具有中等的的生活质量,但随着收入分布状况的改善,中等收入与中等生活质量分布曲线差异缩小,逐渐靠拢。

本研究利用ROC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接受者操作特性曲线)做进一步对比讨论。ROC作为一种分析方法,主要用于预测准确率情况,最开始运用在军事领域(如通过降低飞鸟信号对敌机信号的干扰,增加预报准确性),后广泛用于医学研究,可判断某种因素对于某种疾病的诊断是否有价值,后机器学习领域也开始广泛使用。如图3所示,ROC曲线图可反映敏感性与特异性之间的关系,其横轴为1-特异度,也称为假阳率(False Positive Rate, FPR)或误报率,是指阴性人群中检测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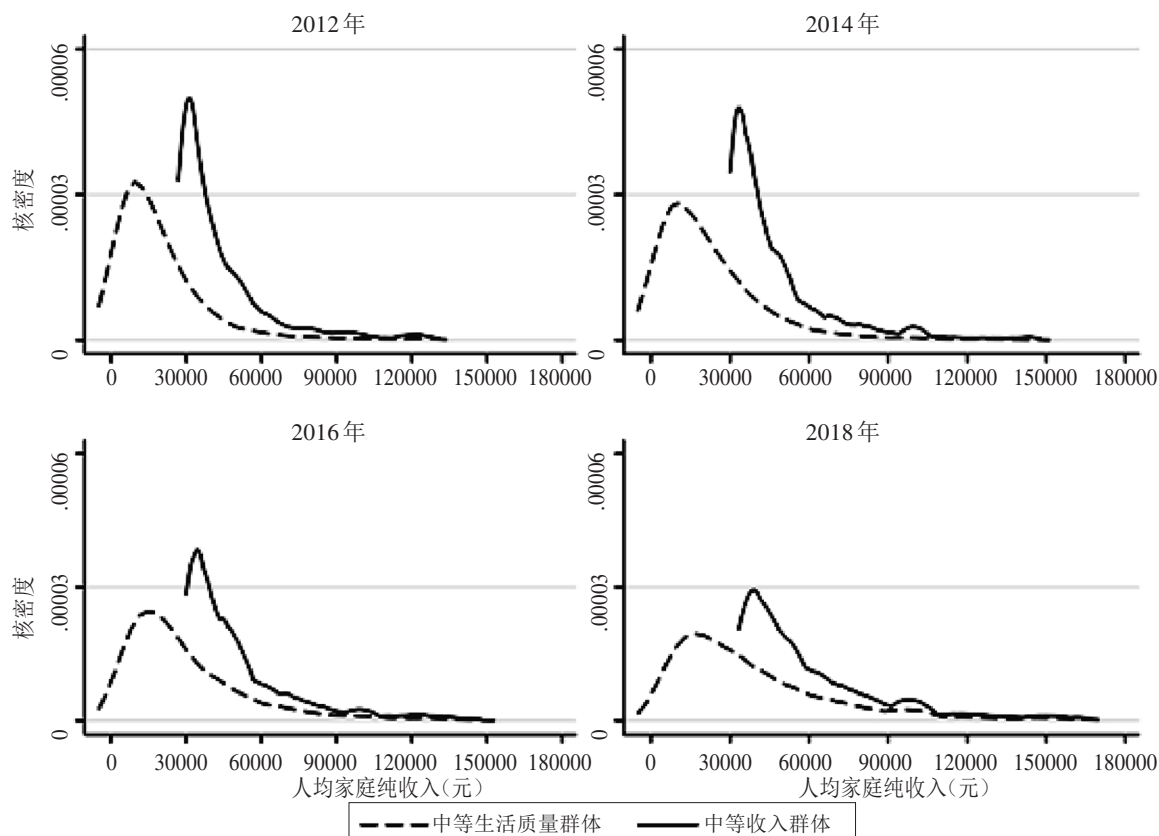


图2 2012—2018年我国中等生活质量群体和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分布

注: kernel = epanechnikov, bandwidth=5000。

阳性的概率,横轴越接近于零,准确率越高;纵轴为敏感度,也称为真阳率(True Positive Rate, TPR),指阳性人群中检测为阳性的概率,纵轴越接近于1,准确率越高。ROC曲线必定起于(0,0),止于(1,1),并将1×1的图划分为两部分,曲线下方的面积(Area Under Curve, AUC)可表示预测的准确性,曲线越接近左上角(假阳率越接近于0,真阳率越接近于1),AUC值越高,即曲线下方面积越大,说明预测的准确率越高。由表2的二分类混淆矩阵(也称为误差矩阵)可知: $TP+FN=P$, $FP+TN=N$ 。其中横坐标(1-特异度)计算公式为: $FPR=1-TN/(FP+TN)=FP/N$;纵坐标(敏感度)计算公式为: $TPR=TP/P$ 。

本研究分别以生活质量法和另外三种主流方法作为基准进行对比。首先,以生活质量法作为金标准,使用ROC曲线分析方法对比不同的中等收入标准对中等生活质量的预测准确度,其中真阳率指满足中等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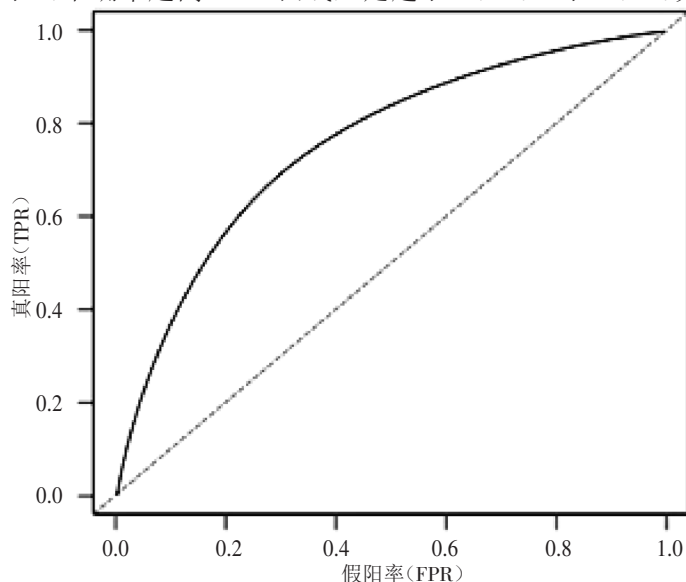


图3 ROC曲线示意图

表2 二分类混淆矩阵

		预测值		计数
		阳(P)	阴(N)	
实际值	阳(P)	真阳(TP)	假阴(FN)	P
	阴(N)	假阳(FP)	真阴(TN)	N

活质量的群体中达到中等收入标准的比例,假阳率指不满足中等生活质量的群体中达到中等收入标准的比例。在生活质量法与收入标准的对比中,本研究选取了三个收入标准:(1)国家统计局^[17]提出的三口之家年收入在10万元—50万元之间;

(2)杨修娜等^[32]提出的人均年收入中位数的67%—200%;(3)李春玲^[28]提出的人均日收入10美元—100美元,预测中等收入标准对中等生活质量预测的准确率。如表3所示, $AUC_{(3)} > AUC_{(1)} > AUC_{(2)}$,但无论哪种测度标准,AUC值均未超过0.7,这还是说明了两种测度方法本质的不同,使用标准(1)测度时,敏感度较低但特异度较高;标准(2)测度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均较低;标准(3)的敏感度较高但特异度相对较低。结合AUC值看,标准(1)(3)明显比标准(2)与中等生活质量的匹配度更高,但尚不能认定(1)(3)与生活质量法更为接近,这两个标准的收入区间均较为宽泛,更容易将中等生活质量群体纳入。同时,经过对中等收入上限及下限的多轮测试,发现人均收入处于2万元—16.7万元(记为收入标准(4))时AUC值最高,达到0.6677。

为进行更充分地比较,本研究再以上述收入标准(1)(2)(3)(4)分别作为金标准,使用ROC曲线预测中等生活质量对中等收入的准确度,其中真阳率指满足中等收入的群体中达到中等生活质量的比,假阳率指未达到中等收入的群体中满足中等生活质量的比,测算结果如表3所示。可看出,以中等生活质量预测中等收入时, $AUC_{(1)} > AUC_{(4)} \approx AUC_{(3)} > AUC_{(2)}$,但实际上标准(1)对应的收入区间(33333元—166667元)要小于标准(3)和(4)对应的收入区间,中等收入下限也为最高。综上,本研究认为收入标准(1)与生活质量法的测度最为接近。收入标准法与生活质量法不存在绝对的优劣,而是取决于主要的研究目的、已有数据的质量等。不同的测度工具解决不同问题,若数据维度相对单一或主要研究目的为测度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及占比时,可以三口之家年收入10万元—50万元(即家庭人均年收入33333元—166667元)^①测度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及占比,其与生活质量法的测度结果更为接近;若微观数据维度相对丰富、或在研究上侧重于对中等收入群体更深层次的特征、流动性等研究,则可尝试以微观基础更为扎实的生活质量法测度。

表3 以不同测度方法为金标准的ROC分析指标:基于CFPS2018(N=12261)

金标准	收入标准	敏感度(%)	特异度(%)	AUC	标准误
以生活质量法为金标准	(1)三口之家年收入10万元—50万元	45.59	82.93	0.6426	0.0046
	(2)人均年收入中位数的67%—200%	47.12	65.32	0.5622	0.0049
	(3)人均日收入10美元—100美元	59.53	72.05	0.6579	0.0048
	(4)人均年收入2万元—16.7万元	68.98	64.57	0.6677	0.0047
以不同收入标准为金标准	(1)三口之家年收入10万元—50万元	51.98	79.00	0.6549	0.0050
	(2)人均年收入中位数的67%—200%	35.51	75.29	0.5540	0.0043
	(3)人均日收入10美元—100美元	46.32	81.46	0.6389	0.0043
	(4)人均年收入2万元—16.7万元	44.10	83.70	0.6390	0.0040

注:具体测算中,2018年三口之家年收入10万元—50万元相当于人均年收入33333元—166667元,人均年收入中位数的67%—200%相当于人均年收入16224元—48672元,人均日收入10美元—100美元相当于人均年收入24154元—241535元。

①国家统计局测度中等收入群体时“三口之家”的假定显然是为了普及化的说明,中等收入家庭并非仅限于“三口之家”,但由于并非公布具体的标准,单纯使用家庭收入10万元—50万元的标准也忽略了家庭规模的影响,因此本研究认为人均家庭收入33333元—166667元标准可操作性和准确度更强。

四、总 结

本研究从中等收入群体概念中的生活质量出发,通过反映生活质量(食、住、行、娱、健)的五个指标定义中等收入家庭,有效补充了中等收入群体界定中只关注收入而忽略生活质量的弊端。这些生活质量的指标考虑到了家庭的资产情况(如住房条件、汽车拥有情况)、支出结构(如恩格尔系数)、生活品质(如文娱旅游、保健美容)等。同时,以相对标准为主的生活质量指标,较少受到地区收入或支出水平差异的影响。因此,使用生活质量标准识别中等收入群体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本方法在微观数据支持下具有一定的推广性,也为学者或政策制定者在收入增长之外应更多地关注民众生活质量提供了基本方法,可对中等收入群体进行深入研究,更好地回答政策问题。同时,如果研究目的仅为测度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直接使用国家统计局的标准与生活质量法所得的测算结果基本接近。

长远来看,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维度上的收入增长、收入分配公平,也是社会意义上的人民生活质量提升。生活质量的提升一方面源于个人自身收入增长带来的生活质量改善,另一方面来自于整体生活环境或公共物品提供质量的改善。个人收入增长能力主要依赖于自身人力资本的积累程度,因此持续保持身体健康、不断通过教育提升专业技能对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至关重要。当然,人力资本积累的个体差异主要源于个人投资的差异,但社会整体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依赖于公共投资,这种投资可从长期对整个社会发展产生正外部性。整体生活环境或公共物品提供质量的改善则主要依赖于政府,政府应通过合理筹集财政收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完善欠发达地区和农村的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从公共支出层面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同时,应有效推动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行业结构、职业岗位结构调整与优化,以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制度完善为直接手段,调动中等收入群体的劳动积极性,巩固和提升其收入水平,并带动越来越多的低收入群体进入中等收入群体,享受中等水平的生活质量,实现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及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

参考文献:

- [1]国家统计局局长就2021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答记者问[EB/OL].(2022-01-17)[2023-01-31].http://www.stats.gov.cn/xsgk/jd/sjjd2020/202202/t20220209_1827283.html.
- [2]《中国的全面小康》白皮书新闻发布会答记者问[EB/OL].(2021-09-28)[2023-01-31].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109/t20210929_1822623.html.
- [3]我国形成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等收入群体[EB/OL].(2017-12-20)[2023-01-31].http://www.gov.cn/xinwen/2017-12/20/content_5248927.htm.
- [4]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EB/OL].(2020-11-03)[2023-01-31].http://www.gov.cn/zhengce/2020-11/03/content_5556991.htm.
- [5]扎实推动共同富裕[EB/OL].(2021-10-15)[2023-01-31].http://www.gov.cn/xinwen/2021-10/15/content_5642821.htm.
- [6]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2022-10-25)[2023-01-31].http://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
- [7]陶 冶.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有效途径——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扩中”的探讨[J].上海经济研究,2006(9):32-37.
- [8]朱土兴.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收入比重的路径[J].经济科学,2007(3):124-128.
- [9]陈新年.有效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J].宏观经济管理,2012(5):25-26.

- [10]李培林,朱迪.努力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基于2006—2013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数据的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15(1):45-65+203.
- [11]李强,徐玲.怎样界定中等收入群体?[J].北京社会科学,2017(7):4-10.
- [12]郑功成.完善民生保障 促进共同富裕[N].中国劳动保障报,2021-08-31(3).
- [13]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和社会发展研究所课题组.中等收入者的概念和划分标准[J].宏观经济研究,2004(5):53-55.
- [14]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中等收入者的定义和划分标准[J].经济研究参考,2005(5):2-8.
- [15]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课题组,常兴华,李伟.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实证分析和政策建议[J].经济动态,2012(5):12-17.
- [16]国家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局长就2018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答记者问[EB/OL].(2019-01-21)[2023-01-31]. http://www.stats.gov.cn/tjsj/sjjd/201901/t20190121_1645944.html.
- [17]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2021—2025年)[EB/OL].(2021-07-19)[2023-01-31]. https://www.zj.gov.cn/art/2021/7/19/art_1552628_59122844.html.
- [18]张翼.当前中国中产阶层的政治态度[J].中国社会科学,2008(2):117-131.
- [19]李强.中国离橄榄型社会还有多远——对于中产阶级发展的社会学分析[J].探索与争鸣,2016(8):4-11.
- [20]李春玲.中国当代中产阶级的构成及比例[J].中国人口科学,2003(6):29-36.
- [21]李春玲.如何定义中国中产阶级:划分中国中产阶级的三个标准[J].学海,2013(3):62-71.
- [22]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课题组.6万—50万元:中国城市中等收入群体探究[J].数据,2005(6):39-41.
- [23]MILANOVIC B, YITZHAKI S. Decomposing world income distribution: Does the world have a middle class?[J].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2002,48(2):155-178.
- [24]常兴华.界定中等收入者[N].国际金融报,2003-12-30(3).
- [25]白景明,周雪飞.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状况及财税调节政策[J].财经论丛(浙江财经学院学报),2003(3):24-36.
- [26]任昊,秦敏.我国人口结构对消费的影响:需求侧视角下多维度社会人口结构的再考量[J].商业经济研究,2021(23):38-41.
- [27]李春玲.中等收入群体的构成特征与新时代“精准扩中”策略[J].统一战线学研究,2018,2(1):27-32.
- [28]FOSTER J E., WOLFSON M C. Polarization and the decline of the middle class: Canada and the US[J]. Journal of economic inequality,2010(8):247-273.
- [29]龙莹.中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动态变迁与收入两极分化:统计描述与测算[J].财贸研究,2012,23(2):92-99.
- [30]杨修娜,万海远,李实.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及其特征[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3(6):10-22.
- [31]阮敬,王继田,刘雅楠.中等收入群体与橄榄型收入格局的结构演化——基于推动共同富裕的研究背景[J].统计学报,2021,2(1):1-15.
- [32]吴鹏,常远.中等收入群体的测算与现状研究——基于CHNS与CHIP数据[J].社会科学研究,2018(2):72-82.
- [33]李培林,张翼.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认同和社会态度[J].社会,2008(2):1-19+220.
- [34]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 [35]KHARAS H. The unprecedented expansion of the global middle class: An update[J]. Global economy and development, 2017,28(4):47-85.
- [36]ABHIJIT V. BANERJEE, ESTHER DUFLO. What is middle class about the middle classes around the world?[J].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8,22(2):3-28.
- [37]李培林,张翼.消费分层:启动经济的一个重要视点[J].中国社会科学,2000(1):52-61.
- [38]甘犁.中国有多少中产阶层?[EB/OL].(2015-11-18)[2023-01-31]. http://www.p5w.net/news/xwpl/201511/t20151118_1264304.htm.
- [39]CREDIT SUISSE. Global Wealth Report 2018[R]. Zurich:Credit Suisse,2018(10).
- [40]狄煌.合理界定中等收入者[N].经济参考报,2003-02-12(4).

- [41]苏海南.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产生、发展和现状[J].人事天地,2016(12):9-11.
- [42]李强,赵罗英.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和中等生活水平研究[J].河北学刊,2017,37(3):151-157.
- [43]李实.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及其变化趋势[J].社会治理,2017(6):32-34.
- [44]邢占军.主观幸福感测量研究综述[J].心理科学,2002(3):336-338+342.
- [45]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2022-02-28)[2023-01-31].http://www.gov.cn/xinwen/2022-02/28/content_5676015.htm.
- [46]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发展成就显著[EB/OL].(2020-10-23)[2023-01-31].https://www.mohurd.gov.cn/xinwen/jsyw/202010/20201023_247686.html.
- [47]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课题组.2020我们住什么样的房子——中国全面小康社会的居住目标研究[J].建设科技,2004(23):41-43.
- [48]“宜居城市科学评价指标体系研究”项目组.宜居城市科学评价标准[S].北京:建设部科学技术司,2007:17.
- [49]《我国房地产税立法问题研究》课题组,王朝才,张学诞.我国房地产税立法问题研究[J].财政科学,2016(6):54-64.
- [50]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家庭问卷[R].成都: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2019:84.
- [51]上海市开展对部分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试点的暂行办法[EB/OL].(2011-01-27)[2023-01-31].https://www.shanghai.gov.cn/nw12344/20200814/0001-12344_24523.html.
- [52]宣长春,陈瑞.社交媒体使用对积极生活状态的影响:倒U型关系与年龄的调节效应[J].国际新闻界,2022,44(3):94-114.
- [53]孟昕,黄少卿.中国城市的失业、消费平滑和预防性储蓄[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1(6):40-50.
- [54]陈玉宇,行伟波.消费平滑、风险分担与完全保险——基于城镇家庭收支调查的实证研究[J].经济学(季刊),2007(1):253-272.

(收稿日期:2023-03-21 责任编辑:杨锦英)

Research on the Standards and Measurement of the Middle-Income Group in China --Based on Life Quality Approach Kong Tao, Wu Qiong, Chen Shao-bo

Abstract: Increasing the population share of the middle-income group (MIG) is an important policy goal of China. To achieve the so-called "olive-shaped" social structure necessarily requires MIG to constitute a greater share than either the high-income or low-income groups. A review of criteria to identify MIG suggests that existing measure are generally income-based only, containing few indicators of living standards. To address this limitation, we propose a life quality-based method to identify MIG and contrasts it with previous measures. By employing ROC analysis, we further demonstrate the advantages of the new method and discuss the suitable scenarios where it can yield valuable insights and generate powerful policy implications. Using the nationally-representative sample of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2012-2018), we find that the share of China's MIG has been gradually increasing over recent years. By 2018, 31% of Chinese households (approximately 360 million people) have met the MIG criteria with commensurate quality of life.

Key Words: Middle-Income Group; Measurement Standard; Quality of Life; Common Prosperity